

北大教授与 《新青年》

张耀杰 著



新青年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the *New Youth*

张耀杰 著

北大教授与
《新青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 张耀杰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33-1503-6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期刊-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0654号



策 划: 邱特聪
责任编辑: 陈万龙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邱特聪设计·邱特聪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7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54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03-6

定 价: 4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王思睿序 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

张耀杰的新书将要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作为比他年长的学友读者，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张耀杰多年来围绕政学两界尤其是民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胡适当年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张耀杰的民国史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向型的辨别异同、清理门户，就是与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作派、腔调划清界限。有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思想界前辈，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上还带有严重的专制倾向，张耀杰查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较为清晰地呈现还原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那一代知识精英，事实上难以自我克制专断思维和专制习性的盲点误区、历史局限。

辨别异同、清理门户是外向型的据实甄别。与此同时还需要内向型的凝聚共识、积聚精粹。如果把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看成是纯而又纯的价值标杆，就连率先提倡这种价值观念的胡适本人，也是不能够完全达标合格的，这就削弱了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积累沉淀的本土资源。我们应当注重挖掘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一重要的社会力量，才能增强与人类共同体正常接轨并且最大限度地推动历史前进的自信心。有些人从整体上看并不是

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时段或一些侧面却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正能量，我们就应当把它提炼升华出来，并汇集到中国社会的本土资源中。有的人做过不少错事，最终却有所反思和补救，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就不应当被抹杀，譬如说晚年有所反思的陈独秀和最终放弃专制独裁的蒋经国。

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当时我就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中国社会过去二三十年间追逐世界主流文明的步伐给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这么说的时侯，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60年里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径罪错。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逆转。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持批判态度，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胡适和《新青年》同人基于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所鼓吹倡导的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劳工神圣、民主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总体上是正确和进步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北京《晨报》上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有所走偏，也就是跟着国际社会最为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价值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

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20世纪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胡适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的灵魂人物，他的所作所为过度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尽管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有部分契合之处。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勱、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应该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学两界的主流是反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存在着。如何让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前就率先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普及推广为大多数中国人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还需要有更加年轻新锐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深入探索，以便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合力。张耀杰的这本新书，只能算是小小的开端。

目 录

王思睿序 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反思/1

绪论 《新青年》轮值编辑的历史真相/001

一、《新青年》轮值编辑考	002
二、胡适与罗家伦等人的历史记录	013
三、鲁迅与沈尹默的历史虚构	017
四、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020

第一章 一校一刊的政学传奇/028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028
二、陈独秀笔下的“批评时政”	031
三、《新青年》“复活”为同人刊物	038
四、《新青年》扭亏为盈	041
五、《新青年》编辑部的资本积累	046
六、陈独秀单边毁约	050
七、北京同人的民主表决	058
八、《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	065
九、胡适的“变节”与“歧路”	071

第二章 蔡元培对陈独秀的借重与免职/074

一、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074
二、以德治校的进德会	082
三、陈独秀的“绝对之是”	084
四、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通信	089
五、《新青年》的戏剧之争	093
六、林纾与张厚载的联合反击	096
七、胡适和陈独秀的强烈反弹	099
八、蔡元培亲自出马	103
九、对陈独秀的变相免职	108
十、北大评议会的制度缺失	116

第三章 陈独秀与胡适的路径歧异/123

一、陈独秀与胡适的最初碰撞	123
二、胡适的“正宗”与“悍化”	127
三、陈独秀与胡适的“联合战线”	132
四、胡适与陈独秀的政治决裂	138
五、陈独秀的价值混乱与道德缺失	145
六、胡适的以人人为本价值观	149

第四章 钱玄同的伐异与胡适的求同/157

一、钱玄同加盟《新青年》	157
二、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161
三、钱玄同与胡适的精诚合作	166
四、《新青年》同人的精神歧异	171
五、钱玄同的伐异与胡适的求同	174
六、胡适与钱玄同的民治思想	179
七、“偏谬精神”的再度激活	186
八、钱玄同与胡适的后续交往	192

第五章 刘半农与胡适的善始善终/198

一、《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198
二、刘半农崇拜周作人	203
三、刘半农淡出《新青年》	209
四、刘半农的新与旧	215
五、刘半农向胡适认错致敬	219
六、鲁迅与刘半农反目成仇	223
七、刘半农与胡适善始善终	229
八、刘半农的身后是非	234

第六章 沈尹默与胡适的相互攻讦/241

一、民国初年的严复与蔡元培	241
二、北京大学的派系斗争	246
三、沈尹默与蔡元培	252
四、“某籍某系”与陈独秀	259
五、沈尹默与胡适的相互攻讦	264
六、五四运动中的胡适与沈尹默	267
七、胡适与蔡元培的求同存异	272
八、沈尹默笔下的蒋梦麟	277

第七章 高一涵与胡适的同住与反噬/285

一、高一涵的模糊简历	285
二、与章士钊、李大钊的早期合作	288
三、《新青年》的“思想革命”	293
四、与胡适的同住经历	296
五、与胡适共同努力	305
六、努力之后的精神碰撞	311
七、高一涵反噬胡适之	315
八、“摸风捉影”的历史虚构	320

九、高一涵与章士钊	326
十、晚年胡适的口述回忆	329

第八章 周作人的价值混乱与路径迷失/334

一、周作人晚年的造谣说谎	334
二、忠实原著的“直译的方法”	340
三、《小河》中的劣败心理	344
四、周作人探访日本“新村”	347
五、周作人设立新村支部	351
六、新村运动风行一时	355
七、胡适批评新村运动	359
八、胡适批评工读主义	362
九、来自鲁迅的质疑否定	366
十、“新村”梦想的退潮幻灭	372

后记 一校一刊的研究历程/376

绪论 《新青年》轮值编辑的历史真相

2005年10月，笔者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随后，笔者把该文收入2006年出版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其中得出的结论是：《新青年》第四卷共6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6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6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由于陈独秀被变相免职和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六卷各期没有能够按时出版，时间被拉长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七卷一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又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该杂志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就此终结。^①

8年过去，围绕《新青年》轮值编辑的相关讹误依然普遍地存在着。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针对《新青年》编辑部的轮值编辑名单，重新进行一番学术考据。

① 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一、《新青年》轮值编辑考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四卷一号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六卷六号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编辑部同人轮值编辑的。作为民国史上由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强强联合的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仅仅限于这3卷共18期刊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到底有哪些人轮值编辑过这18期刊物？

查勘周作人日记，1917年8月9日项下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晴，上午往大学收七月上半月俸，……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聚谈至晚十一时去，夜颇热。”^①鲁迅亦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这是钱玄同第一次为《新青年》约稿之事登门拜访寄住在绍兴县馆（又称山会邑馆或绍兴会馆）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②

9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以前论交钱君转送《新青年》。”这里所说的“前论”，是周作人从《北美评论》第717期抄录翻译的学术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原作者是英国学者W.B.Trites。这篇采用浅显文言文进行翻译的学术论文，3个月 after 刊登在陈独秀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一号中，是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0月16日，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其同人团队的最早动

①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8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中季”是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等人一起在日本跟随章太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使用的名字。

③ 《刘半农散文经典》，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联合推动之下，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四卷一号开始转型“复活”为由6名北大教授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启动了以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史谱写了一页辉煌篇章。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收《新青年》四卷一号八本，以赠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齐、陈二君至和记午餐。”^①

同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夜韩寿谦来。”^②鲁迅笔下的“季市”，又写作季葑、季馥、季芾，是时任江西省教育厅长许寿裳的字。鲁迅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郑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准备到这份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中大显身手。

与周氏兄弟的相关记录相印证，钱玄同在191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Jan.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③

在此之前的1918年1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新青年》杂志由主要同人轮值编辑的历史事实：“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与独秀谈，移时叔雅来，即在独秀处晚餐。”^④

在由钱玄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二号中，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作品《古诗今译》。按照周作人晚年的说法，所谓“古诗”就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译时间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

①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729—730页。

② 《鲁迅全集》第14卷，第305页。

③ 《钱玄同日记》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54页。“Jan.15”即1918年1月15日。

④ 同上书，第1645页。

了一篇题记，“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①

查勘《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31日项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广陵潮一本。又以纪事稿寄半农”的记录。所谓“纪事稿”指的就是他所翻译的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古希腊叙事诗，这首标题为《古诗今译》的古希腊牧歌并没有发表在刘半农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而是提前用在钱玄同轮值编辑的四卷二号中。由此可以看出，《新青年》轮值编辑在一人一号、各负其责的基本格局下，相互之间也保持着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刘半农的名字，是1918年2月10日：“晴，星期休息。……晚刘半农来。”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半农来，十一时去。交予……小说一首，题目《童子之奇迹》，入《新青年》中。夜多爆竹，睡不甚安。”这篇翻译小说随后以《童子林的奇迹》为标题，刊登在刘半农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

2月10日是旧历丁巳年除夕，在随后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刊登有四首以《除夕》为标题的白话新诗，作者依次是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他们分别是该杂志第四卷第五号、第六号、第一号、第三号的轮值编辑。刘半农在《除夕》诗中叙述了除夕之夜与周氏兄弟的对话。

在为这首诗所写注解中，刘半农介绍说：“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浦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同样是在2月1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今天起得很早，天未亮便醒了。点起灯看了一会儿的书，天亮明了，便穿衣服起床。那时还不过七点钟，厨子（名阎海）已出去了。因为昨夜我叫他今天午饭办几样菜，为同居的高先生送行……吃过饭便有客来……客去之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4页。

后，我也叫车出门，先到大学法科去寻一位朋友，谈了一刻钟，又到大学文科去办了一点事。五点半钟到一位陶孟和先生家去吃夜饭。陶先生也是大学的教授，是在英国毕业的，学问极好。”^①

这里提到的陶孟和，是《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轮值编辑。行文至此，《新青年》第四卷的六位轮值编辑已经全部出场。“同居的高先生”，就是与胡适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的安徽同乡高一涵。当时的高一涵与他的好朋友李大钊一样，既不是《新青年》轮值编辑，也还没有到北大任职，就住在北大法科也就是北河沿预科宿舍的“朋友”即刘半农那里。刘半农在他自己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中，刊登有一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第十一项写道：“稿件寄交‘北京东安门内，北京大学法科刘复收’；封面应写明‘某省某县歌谣’以便分类保存，且免与私人函件相混。”

《新青年》四卷二号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二月上半月俸，至广学会购《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寿宅。收到《新青年》十册，以一寄霞卿，一还君默。三时返寓……”这里的“陶君”，就是《新青年》四卷四号的轮值编辑陶孟和，当时他正在积极组稿。在此之前的3月6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另有记录：“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并*The Nation*一本……晚译库卜林《皇帝之公园》一篇予《新青年》，十一时了。”

3月11日，周作人日记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说稿交适之”的记录。这里所说的“小说稿”，就是译自库卜林的小说《皇帝之公园》。周作人是通过《新青年》四卷六号的轮值编辑胡适把该稿转交给陶孟和的。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四卷三号的时间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十册。下午往寿宅。归校后微雨，至法科访半农，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七时返寓。”这期杂志首页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刊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是“编辑部同人”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之中，这一启事是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型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与此相印证，胡适在3月17日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表白说：“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①

同样是在四卷三号中，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登了王敬轩与刘半农一唱一和的双簧书信。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在读者来信中以极其肉麻的赞美之词公开点出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随之而来的便是被《新青年》同人引蛇出洞的前辈文人林纾与其亲信弟子张厚载联合发起的以牙还牙的反攻倒算。

由陶孟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四号的实际出版日期比较滞后。查《周作人日记》，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五本”的记录，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三本”的记录。到了5月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一本”的记录。

在《新青年》四卷四号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轮值编辑而由钱玄同、刘半农协助操办的《新青年》四卷五号，已经启动组稿工作。1918年4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4月4日另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至法科访半农，遇玄同谈至五时方返”的记录。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邮寄的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桦派作家、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40页。胡适所说的万字文应该是发表于《新青年》四卷四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经典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个青年之梦》。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作杂文一篇，十二时后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三时返”的记录。

周作人所说的“杂文”，就是随后发表在《新青年》四卷五号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译文交予玄同”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译文”，就是与“杂文”一同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五号的《贞操论》，原作者是日本女学者与谢野晶子。

在陶孟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四卷四号的首页，刊登有一则《本社特别启事》：

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其中材料专以易卜生(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本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禱。

这里公布的《新青年》编辑部地址，其实就是陈独秀的住家。在该期杂志通信栏中，有孙国璋、钱玄同、陶履恭、胡适标题为“论世界语”的来往通信。到了由钱玄同轮值编辑的五卷二号中，另有区声白、陶履恭、钱玄同、陈独秀标题同样为“论世界语”的来往通信。钱玄同以“记者”身份为区声白、陶履恭的来往通信加写跋语说：“我对于提倡Esperanto的意见，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号，尚未蒙孟和答复，现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说。但四卷四号孟和答孙芾仲君信里所说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